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四九期 ——
(二〇一〇年五月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5a)

【史海钩沉】	1968年春的北京高校学习班	卜伟华
【回首文革】	安东尼奥尼与影片《中国》的风波	杨正泉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十二)	舒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1968年春的北京高校学习班

• 卜伟华 •

从1967年10月以后，全国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大办学习班，大反派性，全国混乱局面相对缓和。但自1968年春天开始，随着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杨余傅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全国各地的派性斗争又趋激烈，武斗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刑讯逼供等现象，导致大批非正常死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68年春的北京高校学习班就是在这一时期举办的，随着全国新的混乱局面的形成，北京高校学习班草草收场。

一、北京高校学习班概况

北京市革委会在1968年1月27日发出了《关于分批分期组织大学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北京市革委会从1967年11月就开始酝酿给北京各大学造反派头头办学习班，一直因

为各校派性斗争激烈等原因难以实现。到1968年2月，形势才稍有缓和。当时，北京市18个区县已有16个成立了革委会，有两个成立了革委会的筹备委员会。而中小学的情况，据当时负责北京市学校军训工作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百分之百实现了大联合，95%以上建立了三结合”。而全北京的62所大学“有21所建立了三结合，3所建立了大联合临时领导机构，还有将近40所没有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革委会决定分期分批开办北京高校造反派头头学习班。北京市革委会原来打算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举办第一期学习班，组织20所院校的各派组织头头200多人参加学习。不在20所院校之内的中国科技大学的两派群众组织闻讯后，主动要求参加学习，获得批准。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和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丁国钰分别担任学习班的正副书记。参加学习的人按军队的建制方式，分编成5个连。

学习班于1968年2月5日正式开学。开学几天后又根据“中央首长”的要求，增加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航空学院4所院校。这样，共有25所院校的造反派头头251人参加学习班的学习。

后来根据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报告（指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8年2月10日下发的《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指示精神，以及谢富治传达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指示，决定扩大学习班的规模。谢富治在学习班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到学习班一再扩大的原因：“我有一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说：‘云南来了多少人？’我说：‘700人。’本来一个省700人是比较多的，主席说：‘那不够，再增加一倍。’（“云南班”学员后陆续增至2000多人。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档案馆《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因此学习班从数量上各方面都要加强。我们北京的大学生（学习班）也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加强的。还有一个原因，同学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有缺点的人，做事情不是那么敢想敢干，作事情总是经过上级一再提醒甚至批评才做好。我们这个训练班，中央文革、总理一再关心，为什么这个学校没来，为什么那个学校没来。所以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学校。还说，学生、干部都应该增加，一个学校要增加四五个，所以才这样一再增加。”

1968年2月20日参加学习班的院校由25所扩大为36所（即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化纤学院、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机械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化工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电力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铁道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林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农机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外交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学员由群众组织头头，扩大到各校的干部和职工，总人数达到1406人，是原来计划办第一期学习班人数的5倍多。按学习班的要求，各校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二、三把手都必须参加学习。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以及各校造反派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是学习班的学员。学习班的时间也由原定的三个星期改为没有期限。谢富治在动员大会上说：“至于我们这个学校办多长时间，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算，先解决问题先毕业，后解决问题后毕业，不解决问题不毕业。”

在学习班开办之初，受社会整体舆论导向的影响，在消除派性方面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特别是在那些原来两派对立情绪就不甚严重的学校。在学习班上还出现了一些不争地位、不争名额搞大联合的现象。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北京化纤学院、北京水电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农机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等院校建立

了“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北京机械学院成立了革委会筹备小组。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的两派对立组织达成了大联合协议，向消除派性，建立统一的临时权力机构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院校，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特别是19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传入学习班后，在学习班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部分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提出“打倒派性，斩断黑手”的口号，提出要搞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反党集团，要“斩断他们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揪出他们的后台”。一时间在学习班内外出现了各种传言，学习班内人们的思想也十分混乱。尽管在学习班举办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曾几次亲自接见，但依然难以稳住学习班的阵脚。

最先在学习班挑起事端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由于戚本禹在过去的讲话中一贯坚决支持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多次对“造反兵团”进行批评和指责，所以戚本禹垮台的消息一传出来，“造反兵团”立即向以谭厚兰为首的师大“井冈山”发难。他们在学习班中，以及在社会上散发声明和传单，提出打倒王关戚林反党集团，要斩断黑手，揪出后台。2月19日，师大“造反兵团”提出“学习班必须收回戚本禹在1967年12月27日就北京师范大学问题的讲话”，否则不参加学习。由于目的没有达到，2月22日，北师大“造反兵团”宣布退出学习班。他们还散发传单、声明，贴出攻击谭厚兰等人和学习班的大标语：“现在是揭开北京市高校派性盖子的时候了！”“学习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学习班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习班不发动群众揭发王、关、戚、林反党集团！”“学习班空谈派性，捂住盖子，掩护黑手！”“学习班领导人把学习班引向资产阶级方向！”

师大“造反兵团”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了人大“三红”、“政法兵团”、民院“抗大”、轻工“红鹰”等“天派”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响应。2月23日还发生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总部”20余人冲击学习班，踢破房门，企图揪走参加学习班的学习人员的事件。虽然此事由于李钟奇出面制止，没有扩大事态，但是对刚刚开办才半个月的学习班说来，不能不留下深重的阴影。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学习班又恢复了相对的平静。参加学习班的人们开始进行“亮私、斗私”。2月28日，清华“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检查了自己1967年以来，出于在“两个司令部斗争中建奇功”的目的，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以及在校内压制“四一四”，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采取残酷打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错误，他亮出了企图自己一派掌权，搞臭“四一四”，使他们在进入革委会后也成为陪衬，以垄断清华大权的隐私。2月29日，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也检查了自己不听中共中央的指示，大搞派性活动的问题。其他院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也在学习班上做了类似的“亮私、斗私”。但是他们这些检查，实际上都是敷衍塞责，做表面文章，依然带有很强的派性倾向，都认为对立观点的红卫兵组织中有“黑手”，想从对方组织中抓“黑手”，斩断“黑手”，进而达到搞垮对方，证明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这种“亮私、斗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学习班内部的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止过。

二、学习班里的明争暗斗

3月4日，北京大学参加学习班的聂元梓等人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提出在北京出现了一种不准讲阶级斗争，不准讲路线斗争，宣扬派性就是一切的“怪现象”，社会上出现了右倾苗头。（聂元梓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信的主要内容是讲“对派性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并说，信是请中央文革办公室转送的，“毛主席看了这篇报告，非常欣赏，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江青扣下来，没有对我讲。她只是对我说，‘你们战斗队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了。’从她的口气听出来，毛主席对这个报告是很欣赏的。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个短评，标题用的就是《对

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内容是讲派性也是阶级性，讲‘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句话是毛主席讲的，是毛主席对‘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这篇报告的批示。但是，毛主席的批示全文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江青就没有对我透露了。”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人时说：“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连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讲不让串连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3月5日，聂元梓等人贴出题为《是彻底揭开北京高校问题的时候了》的大字报。

3月6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大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中学校群众组织代表时，师大“造反兵团”告了学习班负责人的状。师大“造反兵团”的王颂平在发言中说：“我们被赶出了学习班，学习班负责人坚持戚本禹12·27讲话原则，在学习班不是来解决大联合问题，而是解决什么兵团反革委会问题，这句话是谭厚兰亲口对我说的，为了捍卫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原则，在2月22日，学习班负责人接见我们的时候，又把我们打成‘四反一捣乱’组织，说我们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滚出学习班，甚至说要把我们当反革命抓起来……”聂元梓也在会上对学习班负责人加以谴责，说：“我觉得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起掩盖黑手的作用，在学习班不能说提高路线斗争觉悟、阶级觉悟，我们在学习班贴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高路线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观念’，也被人说成是派性十足。我们本来也想向其他学校学习，可是又不行，叫‘派性串连’……”她提出“要揭派性盖子”。

3月9日，以“新北大公社总勤务组”的名义贴出了《揭开派性斗争的盖子，将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影射、批判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谢富治。3月11日，“新北大公社”参加首都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贴出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指责高校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用‘派性斗争’掩盖高校的阶级斗争，用所谓克服‘派性’，打击和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

3月13日和15日，由人大“三红”、新人大“革命造反联络站”、轻工“红鹰”、“新北大公社”、师大“造反兵团”等十几所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发起召开了两次串连会。聂元梓等出席了串连会。这两次串连会的矛头是指向学习班的，在串连会上的发言普遍认为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方针、方法都有问题，不解决学习班的问题，“就会影响揭开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的盖子”。人大“三红”代表在发言中说：“可是学习班，刘邓陶没有了，关王戚林反党集团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整群众的派性。不去调查黑手，不去调查各校的现状，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压制打击，使黑手逃之夭夭。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学习班大搞调和、折中，不准讲分歧，对矛盾能掩盖就掩盖，否则就是派性发作。要让保守派吃掉革命派，让大权落在保守派手中。”轻工“红鹰”的代表说：“丁国钰之流不突出政治，不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张口派性、闭口派性，对‘四大’怕得要命，甚至连几个同志互相帮助也说成是派性串连。”北外“红旗”代表在发言中说：“前几天还有这种论调：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百年以来反帝斗争的创举。有人说，关王戚林问题没见过报，两派联合声明中不准讲，一讲你为什么就心里难受呢？就如丧考妣呢？”“新北大公社”的代表说：“学习班已经一个多月了，共同性的问题，实质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是负责人的指导思想有问题，不抓阶级斗争，不走群众路线，不许串连，一串连就说是派性。”“极左被识破，就从右的方面进攻，表现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路线斗争说成是派性斗争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从戚本禹的垮台，联想到与之关系密切、沆瀣一气的谢富治。于是他们便四处活动，收集和整理了一批谢富治的材料，酝酿掀起“倒谢”活动。

经过一番准备，在1968年3月初，从人大“三红”等组织中传出“谢富治停职反省”的消息，同时出现了“土皇帝已死，地头蛇跑不了”大标语，人大“三红”、“一二二纵队”公开提出要揪“谢本禹”，从而掀起了炮打谢富治活动的序幕。

继人大“三红”之后，3月5日，地质学院“二团”贴出了影射攻击谢富治的大标语：“砸烂关王庙，揪出大小妖！”3月9日，人大“三红”广播站又广播了编辑部文章《彻底揭开北京两大派斗争的盖子》，3月10日，又在高校学习班以“全体学员”的名义贴出大字报《不能走》，抨击学习班，提出要揪“关、王、戚余孽”。“新北大公社”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全体学员在3月11日贴出的那张《这是为什么？？？》大字报中写道：“学习班的某些负责人却公开宣称：‘不能铺天盖地地讲阶级斗争’，‘学习班主要解决派性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左的思潮”，“他们自己不抓黑手，还反对别人抓黑手，并进而用‘派性内因论’打击坚持抓黑手的革命群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以反对‘派性活动’，排除‘干扰’为名，不许串连，不许贴大字报，看大字报，不许发传单；甚至限制某些学员的行动，跟踪，盯梢，整黑材料，压制不同意见，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能否办好首都高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能否在高校全面落实的头等大事。要不要从根本上扭转高校学习班的方向，要不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学习班办下去，是要不要与刘邓黑司令部与反党集团斗争到底，要不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大问题。”

随着“倒谢”队伍的扩大，事态进一步发展。3月16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造反兵团”贴出了全市第一张点名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谢富治、戚本禹“12.27”讲话必须全盘否定，彻底批判》。当天下午，学部贴出《向“新时代的狂人”的黑后台谢富治开炮》的大字报。北大“井冈山造反总部”贴出《打倒谢富治》、《舍得一身剐，敢把谢富治拉下马》等大字报。人大“三红”贴出了《打倒变色龙谢富治》的大字报。当晚，师大“造反兵团”又贴出大字报《把镇压革命派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

这些大字报和许多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迅速在北京各高校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倒谢”的行列，更多的人则还在观望，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3月17日，“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等8单位在人民大学开会商讨“倒谢”计划。清华“四一四”刷出“炮轰谢富治”等大标语。3月18日，北外“红旗大队”贴出大字报《打倒北霸天谢富治》。在此之后，北京城内相继出现一大批诸如“炮轰谢富治”、“打倒谢富治”一类的大标语及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在一封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说：“你和戚本禹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和他是亲密的，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

中央文革小组对部分红卫兵炮打谢富治的活动是明确反对的。一方面是因为谢富治始终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维护自己由于王、关、戚的相继垮台而遭到损害的形象。3月18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关于谢富治陪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参观北京针织总厂的报道。3月19日，又由谢富治主持首都人民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大会，让谢富治在群众集会上公开亮相。

3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在市革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有人利用革委会、卫戍区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把矛头指向市革委会，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卫戍区，指向我们的主任谢富治同志，说什么‘揪出变色龙谢富治，横扫小爬虫’，什么‘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这是反革命！”吴德在讲话中称谢富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建

立功勋，坚决反对二月逆流，与谭震林做过坚决斗争的谢富治同志”。明确批评了炮打谢富治的行动。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也都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吴德等人的讲话很快向北京各大专院校进行了传达。

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革委会的明确态度，很快就在社会上发生了作用和影响。于是“地派”的一些组织便趁机活跃起来，以维护北京市革委会的名义，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对“天派”施加压力。从3月22日开始，许多“地派”组织分别到学习班驻地、天安门广场、市革委会等处游行集会，散发张贴传单标语口号，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会，坚决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他们提出的口号有“聂孙之流是不折不扣的二月逆流派”、“揪出聂元梓，打倒孙蓬一”。

在中央文革小组明确支持谢富治的情况下，“倒谢”的势力迅速削弱，有些组织在贴出“重炮猛轰谢富治”的大标语后几小时又自己将它覆盖上。“新北大公社”也于3月23日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但北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等组织则揪住此事不放，欲置“新北大公社”于死地而后快。地质“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等组织不断组织队伍到北大示威，高呼“打倒聂元梓”的口号。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处发生了“天派”组织与“地派”组织的冲突以至武斗。

3月25日，谢富治亲自到北京大学，在“新北大公社”广播站发表讲话，针对北大“井冈山”等组织抓住“新北大公社”炮打谢富治的问题攻击聂元梓，要打倒聂元梓一事，明确表示支持聂元梓，批评了北大“井冈山兵团”。通过这一系列的作法和姿态，使得炮打谢富治的活动很快云飞雾散。

三、学习班草草收场

3月中旬以来，江青、康生等人多次在讲话中谈到“目前在全国，右倾是主要危险”，“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的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的指示，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1968年3月21日）后来逐渐演变为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提出：“要继续打击‘二月逆流’的翻案风。要坚定地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此后，全国又出现了新的派性斗争高潮。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条语录一出来，无异于给原来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大火上浇了一瓢油。过去两派对骂，不过是骂对方为保皇派、极左派、“大杂烩”等等，现在都上纲为阶级斗争，都将对方骂为国民党反动派，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斗争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搏斗。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公开提出了“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口号。4月2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一期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做阶级分析》，对这个口号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文章说：“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党性，也没有超阶级的派性。无党性的观点，是资产阶级虚伪的超阶级观点。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这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此后，派性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名义下又开始大行其道。

搞了几个月的“斗私批修”、反派性，好不容易才把形势稳定下来，终于使北京高校一度出现了大联合、三结合的高潮，尽管这个高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假象。但经3月份的炮打谢富治、“反击右倾翻案风”一闹，好景全部化为乌有，许多已经联合的院校都出现了

反复，派性斗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比以前更加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学习班根本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并且难以继续维持。

3月25日，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检讨说：“我们开办的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件大事。在学习班中，也是同样没有抓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道路的根本问题。虽然我在两次讲话中也提到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彭罗陆杨，但讲得不够，几句话就过去了，讲的很多的是放在派性，小将犯错误的问题上，所以同志们有意见是对的，批评的是对的。学习班办得太死，当然在那里的军队干部作了很多工作，错误是发生在领导人的身上。”“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他还表示：“学习班要做检查”。

这样一来，又给激烈反对学习班的“天派”红卫兵添了一把火。3月26日，“政法兵团”、二外“红卫兵”等组织公开贴出大标语，指责学习班犯了方向错误，提出“丁国钰之流必须公开检查！”“新北大公社”广播站3月25日在校园内重新播放了批评学习班的大字报稿。3月26日，“新北大公社”组织了有1000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3月30日，李钟奇代表学习班领导小组作检讨，承认学习班“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革命小将的意见也提出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打中了我们的要害。”

学习班办不下去，只得草草收场。

4月19日，学习班举行结业式，李钟奇在讲话中说：“毛主席说，办学习班的时间不要太长了，大体两个月左右。参加学习班的离校两个多月了，尤其是头头，特别是当前阶级斗争激烈，要有正确的领导，回校要立新功。我们征求了大家的意见，经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党委的同意，我现在正式宣布学习班结束。”

就这样，北京高校学习班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情况下草草收场。这一次围剿红卫兵派性、促进联合的努力完全失败。在此之后，北京各高校内派性斗争有增无减，越演越烈，进入了一个矛盾普遍激化，校园武斗之风盛行的新阶段。

□ 选自卜伟华博客

~~~~~

## 【回首文革】

### 安东尼奥尼与影片《中国》的风波

• 杨正泉 •

1972年5月，应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邀请，意大利著名制片人、导演安东尼奥尼率电视摄影团队访华，拍摄了大量素材。他们回去后制作了电视片《中国》，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地区放映，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外事件。

#### ◇ 特批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

事情的具体经过是：意大利与中国1970年11月建交后不久，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我国外交部新闻司提出希望派人到中国来拍片，并特意说明将由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执导。这显然是有意表示重视。此事由意大利驻华使馆转交我外交部新闻司。我方分析，他们要来华拍片的目的，一是表示友好，二是商业运作，但客观上有利于对外介绍中国。我国外交部让驻意

大利大使馆了解情况，提出意见，后经广播局军管小组分管宣传与外事的副组长戴征远和外交部的姬鹏飞、乔冠华同意批准。因为属于广播电视摄影，由广播局发出邀请，并负责接待。陪同人员是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的张文润，分管是广播局负责外事工作的副局长金照。

1972年5月13日，安东尼奥尼应邀率摄影团队访华，在一个月时间里先后到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林县等地拍片，共拍了约35小时的素材。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为罕见的。

那时候，中国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极其神秘的国家”。安东尼奥尼虽然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但他毕竟是外国人，他有自己的阅历、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他又是电视制片人、导演，就特别注意从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社会，以他或他们对中国的好奇心来选取镜头。他们认为，“他们感到好奇的东西，也正是外国人对中国想要了解的东西”（其实，“好奇”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心态）。安东尼奥尼又是一个商业制片人，与我们当时一切为了“突出政治”完全不同，他事先就为片子找卖点而进行设计，争取更多的西方电视台能够购买他们的片子播出，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也必然迎合西方人的兴趣。

他们在采访中也拍摄了中国的某些“伟大成就”，而在编辑制作过程中却刻意选取中国特有的人文、风情、民俗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等镜头，弱化和舍弃了我们认为反映、颂扬“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和发生深刻变化”的镜头；又用西方人惯用的表现手法进行渲染，用对比和正负两个方面介绍中国的现实，迎合西方人的猎奇心理。镜头中有蓝色（衣服）的海洋，蜂拥的自行车车流，光着膀子的人力车夫和农夫，南方水乡的拱桥和乌篷船，缠足的老太太，乘凉的市民，对摄影好奇光着屁股围观的小孩，车间飞花的棉纺厂等，却没有集中表现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南京长江大桥、万吨巨轮、红旗渠、万里长城和取得“伟大胜利”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有人认为，这部片子比较客观地表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人文风情，既反映了中国的进步，也反映了落后面，有助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尤其是对于那些了解中国极少、对中国抱有神秘感的外国人。

#### ◇ “四人帮”对影片《中国》发难

影片《中国》于1973年2月初在意大利总电视台分三次播出，随后在世界广泛发行，西方国家一些电视台购买播映，总的反映是正面的、积极的。中国台湾也购买并进行了播放。也许是出于同一文化的原因，台湾认为影片《中国》是对大陆的负面反映，暴露了大陆的贫穷、落后和混乱。出于这种阴暗心理，他们利用《中国》这一影片对台湾民众进行教育，这成为后来批判影片《中国》时“最有说服力”的依据。

影片《中国》在国外上映后，引起较大反响，褒贬不一，这是对任何事物的正常反应。应该说，这种反应打破了那时国际社会对中国负面认识一边倒的倾向，引起对中国两种不同的议论是一件好事。在影片放映过程中，国外有人向国内反映，《中国》歪曲了中国人民的形象，这引起了国内的注意。按照预先商定，播出片要事先送我驻意大利使馆审看，但直到播出后的10月才交我驻意大利使馆，11月10日传回国内审看。12月12日，姚文元给中央广播局领导打电话说：“请你们查一下，有个意大利记者叫安东尼奥尼，在你们国际联络部陪同下拍了一个电视片，名叫《中国》，发行很广泛。我听说是严重诬蔑中国的。据说，美国人花了25万美金。这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是在你们联络部陪同下拍的，要严肃对待。”广播局闻风而动，立即调查，战战兢兢地写了情况汇报。12月13日，中国外交部向安东尼奥尼提出抗议，表示“遗憾”。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喜欢“歌颂”、“赞扬”，中国人爱听好话，那时的中国又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时期，与世界接触极少，封闭自傲，怎能接受得了《中国》所反映的



现实？怎能容得下半点儿对中国的“不尊、不敬”？

正巧，1973年底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对于“批孔”的用意，许多人心知肚明。正在这时，12月17日，广播局国际联络部有人投其所好，给姚文元写了揭发信，揭发影片《中国》在接待和拍摄过程中“丧失原则”的种种“严重问题”。这正中“四人帮”的下怀，给他们送去一发难得的重磅“炸弹”，“四人帮”借题发挥，对《中国》的上纲批判迅速升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看了影片《中国》和揭发信后，大发雷霆，认为影片“有意歪曲、丑化中国，反对中国共产党，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看了都会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们组织中央政治局的人看，江青、姚文元还在那封告状信上密密麻麻地画了道道，作了批示，印发内部传阅，扬言要进行彻底追查。12月31日，姚文元给广播局打电话说：“政治局的同志看了电视片，非常愤慨，简直不能看下去！这完全是有意地丑化中国人民，丑化社会主义中国，是一部非常恶毒的反共、反华、卖国的电视片，没有一个好镜头。对新中国的东西极端丑化，对中国极端仇视！没有你们的人员做后台，是不可能拍出来的。有关人员要作检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这是反共卖国的，要认真对待！中央要派人调查。”此后立即组成了“反动影片《中国》调查组”。1974年1月8日，江青说：“他们拍了一部很坏的片子，奇怪的是这样的人是我们请来的。”1月9日，江青又对国务院文化组讲：“意大利的那部坏片子，我看了很生气，奇怪的是那样的坏人是我们自己请来的！你们不但要看，还要组织批判，提出处理意见。”江青等人此言一出，立即组织中央和各地内部放映《中国》，组织批判。

1月30日，“反动影片《中国》调查组”向中央文革提交的报告，顺势讨好，添油加醋，上纲上线，诬称接待中存在丧失政治原则的“右倾投降主义”和丧失国格人格的“卖国行为”。《人民日报》奉命在当天第二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长篇评论员文章，声色俱厉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共、反华”和“反动”纪录片《中国》。评论说：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诬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这样，对影片《中国》由内部批判转为公开批判，掀起了全国性的讨伐、批判高潮，并由此波及到对许多涉外领域的清查，波及到对电视、电影，对外国文艺、外国来华人员以及文化交流的清理和讨伐。

#### ◇ “四人帮”追查影片《中国》的“后台”

“四人帮”首先为影片《中国》事件定性，接着是深入追查。江青、姚文元多次强调，这个片子“没有陪同人员和后台是拍不出来的”，称赞写揭发信的人是“反潮流的英雄”。很显然，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在追查后台和当事人。这件事的责任者首先落在中央广播局身上。安东尼奥尼来华拍片是经外交部批准的，但是以中央广播局的名义请来并接待的，当然也涉及到外交部新闻司、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甚至连文化部门和各地的接待部门都没脱得了干系。在进行了

一段轰轰烈烈的追查批判以后，“四人帮”仍然觉得没有“完全搞清楚”，没有如愿以偿，又提出进行深入清查，并把重点放在了中央广播局。江青说，反动影片《中国》“是很坏，很恶毒的，是一部卖国片，认敌为友，外国人拍，与中国人有关系，要彻底搞清楚，还有其他片子”。“你们那里（中央广播局）是要害机关，中央对你们很不放心”。由此，中央文革决定，把《中国》事件与清查林彪“大小舰队”在广播局的活动结合起来，深入调查，组织批判，肃清流毒和进行处理。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从1974年2月6日至10月，在京西宾馆举办“广播局核心小组批林批孔扩大会议”学习班，以“彻底解决广播局的问题”。这个学习班从“中央三台”和各部门选调120多人参加。我当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也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为期长达9个月，其中有7个多月我们吃住都在京西宾馆，不分早晚和休息日，全天候地进行学习批判，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这是我所经历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学习班。这样的学习班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不多见的。

学习班开宗明义地称：“广播局这样的重要单位，又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彻底地解决一下。中央决定采取这种形式，住在京西宾馆集中搞。目的结合批林批孔，联系广播局的实际，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清查林彪反党集团在广播局的活动，你们那里与大小舰队挂了钩，小舰队开进了广播局，还有批判反动影片《中国》，肃清流毒。”当时，我们心里犯嘀咕，学习班的两项内容与“批林批孔”的名字不统一，清查林彪的大小舰队与批判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影片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后来用把“国际阶级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相联系”作了“解释”。学习班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由姚文元负责，领导小组由中央组织口负责人郭玉峰牵头，中央文革成员王某为第二把手，成员有中央组织口的李某、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李某等，他们经常坐镇京西宾馆。学习班开始后，首先用了较长的时间，把批判反动影片《中国》“作为联系实际、揭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盖子的典型事例和突破口”，集中火力揭发批判，深挖幕后指使人。

学习班自然把火力集中在广播局自己身上，认为接待和负责人员严重背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重视国际阶级斗争，提高警惕”的接待方针，表现为“卖国行为”和“投降主义”，白天黑夜利用各种形式促使他们“交代”，大小批判会开了若干次，最后对金照、张文润等给予了严厉的处分。

“四人帮”对这种结果当然不满意。其实，大家心中清楚，“四人帮”这么无知又蛮横地到外交领域发难，又如此大张旗鼓地故意把事情弄大，真正用意绝不在几个接待人员身上，其深层目的是以影片《中国》为突破口，将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这绝不是臆想和推断，从以上“四人帮”的言语中，可以再明显不过地看出他们的用意。具体而言：第一，他们把这件事放在“批林批孔”的大背景下，毫不讳言地强调追查并与“批林批孔”相结合，办学习班与“批林批孔”相联系。第二，谁都知道周总理一直负责我国的外事工作，他们一再把事件定性为外交上的“卖国行为”、“投降主义”，一再暗示要深挖事件的“后台”，再联系在这前后被他们闹得沸沸扬扬的“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一系列涉外事件，他们绝不是毫无目的地就事论事，而是在竭力挤压我国的外交工作，损害我国的外交形象，其用意在周总理身上。第三，具体所指，当时的涉外活动是由周总理审批的，他们总认为这次事件周总理脱不了干系。第四，他们当然会知道周总理和外交部所一直主张的对外接待方针。我清楚地记得，1972年外交部对境外电视台来华拍片有过明确而明智的意见。1972年4月，经外交部和周总理批准，同意邀请南斯拉夫电视摄影组来华拍片一个月。这次拍片也是由中央广播局接待，由我负责陪同。周总理批准、由外交部起草的接待方针中明确规定：“既然让（他们）去的地方就要让拍，他们怕陪同的人制造困难，他们会看陪同人员的脸色行事；他们要正面报道中国，但总是外国记者，他们要吸引观众，要猎奇，但并不是出于恶意；与他们谈什么，拍什么，我们都要事先有准备，很好地安排，所拍胶片可以带回去冲洗。”外交部有关部门在向我们布置任务时，还对此作了具体说明。他们说，对南摄影队要给予友好接待，对其拍片要求，根据以我为主的原则和实际可能尽可能安排；他们要写报道，要多拍素材，是正常的；他们想了解中国，但了解很少，存有许

多糊涂认识，这也是正常的，我们要耐心地做工作，通过他们的电视镜头帮助我们进行宣传。须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今天也未必能完全做到。应该说，这次对安东尼奥尼的接待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显然，“四人帮”有意把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归结到这一指导思想，即没有贯彻他们所主张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重视国际阶级斗争，提高警惕”的接待方针。

“四人帮”的小题大做，连同在这前后发生的“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对内又一次殃及新闻报道和文艺活动，对外引起国际社会的疑虑，误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有趣的是，“四人帮”的小题大做，变成了对影片《中国》的义务推销，世界许多国家争相放映。

据《了望》周刊2009年第37期刘芳所写的《1974：一部纪录片的“恶毒用心”》一文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批判和清理“四人帮”的罪行中，1978年11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提出“四人帮”利用影片《中国》来反对周总理，要外交部好好研究一下。不久，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报告，中共中央作为文件下发，为其平了反。2004年4月25日至12月5日曾经再次邀请安东尼奥尼访华。2007年，安东尼奥尼病逝。这前后的变化，留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话题，尤其是对外宣传。

□ 《百年潮》2010年第3期

~~~~~

【史林一页】

百问九一三（十二）

• 舒 云 •

65、林豆豆是如何向中央报告的？

1971年9月7日，林豆豆一到北戴河，就知道了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林彪到香港，或到苏联。至于李文普是什么时候知道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林彪的？有两种说法。按李文普的说法，他是九一三事件前一天知道的，非常吃惊。按张宁的说法，林豆豆认为李文普可以阻止林彪上飞机，“九一三事件”前五天，就反复做李文普的工作。李文普已经把前因后果全搞明白了。

不过我还是相信李文普的说法。事关重大，林豆豆也不敢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在“九一三”前几天，她确实做了李文普的工作，但只是想让李文普阻止林彪出行，至于去哪里，她没有说。应该是“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才说个半透，没有说去苏联，而只是说去广州，不行了再到香港。

林豆豆向8341部队报告也是这么说的。

听到林豆豆这样的说法，李文普当然大吃一惊。

66、林彪知道飞往蒙古吗？

1971年9月13日凌晨，在山海关机场，在场的人都看见林彪自己爬上的飞机。可是，林彪知道是飞往蒙古吗？

中央专案组把最后接触过林彪的所有人都“圈”起来，但是除了叶群、林立果和林豆豆，没有人知道林立果和叶群的计划是逃往苏联。所以，不可能有人告诉林彪。

林豆豆要求李文普阻止林彪走，李文普拒绝了。

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接到北京方面的指示，让他去对林彪讲，当然不是讲去苏联，而是讲林立果和叶群要弄他走。张宏只走了几步，就被大队长姜作寿叫住，说我们只是外卫，从来不进林家。林立果有枪，万一你去了回不来，我去不去找你？我去了，也回不来，部队谁管？这样，张宏就没有去。

叶群和林立果会对林彪说去苏联吗？

李文普承认，在林办，叶群经常说假话骗人。但他说，叶群大事不敢骗林彪。

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叶群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事，算大事，还是小事？应该算大事吧？叶群怕林彪不同意，让林立果和她一起骗林彪，没想到林立果跟林办秘书说了。在这样的大事面前都敢骗林彪，叶群还有什么事情不敢骗？

林办所有的人都在叶群指使下，参加骗林彪。有一次叶群去政治局开会，林彪问叶群去哪里了，林办服务员王淑媛说了实话，林彪大发脾气。叶群回来把王淑媛狠骂了一顿，威胁说要赶走她。1968年，时任《空军报》记者的林豆豆到青岛采访，在老记者帮助下写了《三下九厂》，化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看到，查问是什么人写的。知道是林彪女儿林豆豆写的，在政治局开会表扬了这篇报道，叶群当然很高兴。以后毛泽东看到林彪，提起这件事，林彪不知道。回来冲叶群发火，问叶群是怎么回事，叶群这才告诉他，但林彪仍然很不高兴。

1969年，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兼空军司办副主任，叶群也没有告诉林彪。

像这样骗林彪的事情不计其数。

1984年，张清霖开会到河南见到林彪的老秘书关光烈。他对关光烈说，林豆豆最佩服你，要你在，不会发生“九一三事件”。关光烈说，那怎么可能？我怎么能阻止？其实非常简单，直接跟林彪说就行了。问题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向林彪揭露叶群和林立果的阴谋，在上飞机前，林彪始终蒙在鼓里。

67、林彪哪也不去，为什么又自己上的飞机？

林彪内勤小陈说，叶群动员林彪走，说林彪说了“民族主义者”。

这就是说林彪不想外逃，可是他为什么又自己上飞机了呢？叶群和林立果不是“硬绑架”，是不是“软绑架”呢？骗林彪自己上飞机，既然不想去苏联，那就到大连避避吧。上了天，林彪怎么能搞得清“大连”还是“苏联”？以前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专机人员说，好几次飞行都是瞒着林彪改变航向。1968年，叶群导演了林彪去井冈山，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九一三事件”。

那是个穿单衣的秋天，草虫子乱叫，浩浩荡荡去了五架飞机，一个团都出动了。为了躲江青纠缠，林彪到了北戴河。江青又要追到北戴河，林彪准备去太行山或五台山、井冈山等。李文普建议去井冈山，叶群说，程世清在下面尽骂江青和“秀才”们，江青正在批江西搞“复旧”，

南昌起义纪念馆都是按中央文革的调子由“造反派”搞的，首长怎么能去江西？于是叶群让李文普安排去太行山或五台山或黄山，李文普说安排不了。叶群说，井冈山会师纪念馆把朱老总的名字恢复了，那就去井冈山也行。但叫李文普不要安排去南昌。就在叶群听说江青要到北戴河的前一天晚上，林彪和叶群连夜离开北戴河，临时住在山海关机场。叶群把去井冈山一事报告给周恩来，同时对8341部队说，并专门交代吴法宪不要让程世清知道，也不经过南昌，住宿都安排在机场，还规定到井冈山后，也不要程世清安排警卫，总之，不要程世清插手。

你在人家江西的地盘上活动，怎么能瞒住江西的第一把手？第二天，林彪到达井冈山，程世清还是知道了，并到山上与林彪谈过两次。程世清越说越气，大骂中央文革和“上海”。这正对林彪的胃口，可叶群对程世清说，首长身体不好，刚到山上，太疲劳了，大家请休息了。第一次谈了10分钟左右，就赶走了程世清。叶群对李文普、张云生说，程世清这个人尽给首长吹“右风”，规定不准程世清再来见首长，也不准林豆豆接触程世清，并把当地的服务员全调开了。叶群看程世清还在山上，就对他讲，首长说不要影响你工作，你下山去吧，首长来这里只是休息。把程世清“动员”走了。

林彪在山上住了半个月，叶群几次催他回北戴河，林彪坚持不肯下山，最后叶群只好让工作人员集体对林彪说谎。离开井冈山时，叶群规定李文普对程世清保密，限20分钟做好准备，突然离开。临走，程世清赶来送行，叶群感到奇怪，问程世清怎么知道的。程世清说，你不告诉我，我就知道了？叶群说，首长自己要走。程世清不信，要去见林彪，就自己“闯”进去，叶群让豆豆进去支开程世清，说要是首长听他的，又该闯大祸了。程世清对林彪说，这里空气好，你就在这里先养身体吧，你在北京尽受江青和“秀才”们的的气，身体不会好，不要让江青和“秀才”们专了你的政，也不要听叶群的。你不在山上住，就去南昌看看吧。汪东兴说毛主席去南昌没有合适的房子住，叫修两栋房子。林彪说，你不要给我搞这些，我是不会去住的。叶群进来催，说南昌太热了，我们不去了，催促程世清快走。

林彪和叶群坐车下山，半路上被参加会议的干部围住，叶群当面对程世清说，这是你搞的鬼吧？叶群一边说一边下车，同开会的干部打招呼。到了吉安机场，程世清又对林彪说，毛主席每次来江西都去南昌，你这次一定要去南昌看看江西的情况。东道主这么盛情，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林彪当然也很想看看南昌，立即叫李文普马上通知去南昌。叶群凶李文普，你们的车为什么开那么快？为什么不等我？李文普说，这不能怪我呀，首长对你发大脾气了，已经叫我通知机组，决定马上去南昌，叫不要等你。叶群急得小声说，可不能去南昌，重新通知机组改飞北戴河。

井冈山最近的机场在吉安，那是个小机场，还要到樟树机场换大飞机。李文普和林豆豆都对叶群说，这还要了解气象条件能不能飞呢。叶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对李文普说，快快快，来不及了，气象不好也得飞，对首长就说去南昌。接着叶群当面对林彪和程世清撒谎。程世清和林彪上了同一架飞机，叶群硬把程世清拽下来，推他上另一架飞机，叫他先起飞，先去南昌安排一下。这很合情理，程世清先起飞走了。林彪、叶群坐的飞机按叶群的旨意往北飞，林彪在机舱里还问，什么时候到南昌？因为有叶群“监视”着，林豆豆没法跟林彪说实话。飞了半天，林彪奇怪，说怎么南昌还没到？叶群说，不去南昌了，而是回北戴河。林彪发火，我已经通知去南昌，你为什么改飞北戴河？航线不能改了，还是去南昌！战时的林彪说一不二，可现在不是战争年代了。叶群说，我早安排去北戴河了，不好改了，来不及改了，这个机组什么气象都能飞。林彪说，航线要改，还是去南昌！叶群说，江青、“秀才”们正在江西批“复旧”，说程世清与“中央唱对台戏”，你不批转江青那篇大文章，江青恨死你了，现在正要抓你。他们有造反派到处监视你，你如果听了程世清的话去南昌，江青知道你和程世清来往，那又要说你是搞“复旧”的总后台了，又要说你手伸得很长，向地方伸“黑手”，压造反派了，又该整你了。你斗得过他们？你现在身体这个样！林彪说，我见见军队干部，光明正大，怕什么？他们要监

视，随他们监视去。我是南昌起义出来的，难道连南昌都不能去了？在争吵中，飞机继续往北飞，最终也没有到南昌。林彪有什么办法，只好“乖乖地”到了北戴河。

这一次外逃蒙古是不是叶群故伎重演呢？

68、临上飞机前，林彪为什么吃了安眠药？

为什么半夜走？飞机的去向是哪里？为什么要往苏联跑？林彪知道吗？谜太多太多。叶群施加的影响太大了，这位“病元帅”的脑袋也不清楚，怎么走这么一条路？在那个惊慌失措的夜晚，林办工作人员只见叶群和林立果乱了阵脚，而林彪却稳如泰山，吃了安眠药，上床睡了。林彪一般在晚上11时左右睡觉。内勤小陈说，9月12日晚上，林彪吃了药，25分钟起作用。虽然林彪还没睡，但已经迷迷糊糊。

晚11时50分左右，林彪对内勤小张说，马上去大连，不休息了。

注意！林彪说的是去大连！

秘书和内勤都知道，明天6时到大连去。林立果说，赶快走，到大连。警卫科长刘吉纯准备通知大连，刚要通电话，被林立果按下。干什么？打电话干什么？不是准备去大连吗？刘吉纯从来没见过林立果那么凶，瞪着凶恶的眼睛。

不管怎么说，到这时为止，林彪、叶群、林立果口径一致，都是去大连。

为什么到了天上，就变了呢？林彪知道是往苏联飞吗？叶群和林立果是怎样对林彪说的？如果叶群和林立果说是去大连呢？

曾在林彪手下当过参谋处长的中将苏静说，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一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哪里有几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小心极了，“前怕狼后怕虎”，方方面面考虑成熟，才“一锤定音”。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起来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

而“九一三事件”的整个过程慌张零乱，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大将风度？

林彪对毛泽东的了解入骨三分，毛泽东处在绝对有利的地位，想取代根本不可能。说是“副统帅”，一兵一卒也动不了，拉一个排出门都拉不动。林彪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深思熟虑，决不出手。而且林彪的身体坏到离坟墓只有一步半了，成天坐在屋子里，既不打电话，也不召集人，怎么可能政变呢？从林彪的思想和言论中，他并没有想取代毛泽东的意思。那么仓促的暗杀，只有毛孩子才能干得出来。林立果“嘴上无毛”，他身边的人大都在应付他，不敢出头。被指定的暗杀者心里有数，替罪羊，真要成了，马上就杀人灭口。

“九一三事件”刚发生，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上愤怒地说，吴法宪，你说说，林立果不过是个娃娃，你们为什么把他捧得那么高？甚至把兵权交给他？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吴法宪始终不敢抬头，不敢正视周恩来的目光，支支吾吾，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9月天已经凉了，而吴法宪却汗如泉涌，两手不住地交替擦汗。

“九一三事件”10天后，这时“九一三事件”已经开始传达，周恩来到机场送柬埔寨宾

努亲王，顺便在二号楼召集民航干部开会，吴德、吴忠也来了。周恩来说，林立果还是20多岁的娃娃，大学刚毕业就到作战部作副部长兼党办副主任，捧那么高。在上海，还专门给他修了一套很漂亮的房子，谁都不知道这些事，简直不像样子。

很多人都说，做梦也没想到林彪会摔，这事不像林彪办的事。飞机上天容易，深更半夜，异国他乡，飞机落在哪里，下不来怎么办？火急火燎上天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政变”看不出林彪参与其中的痕迹，只像是没有军事常识，没有指挥能力的林立果的“杰作”。

69、“九一三事件”是突然发生的吗？

警卫林彪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九一三事件”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毛泽东，没办到。计划没出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

其实，“九一三事件”是从毛泽东南巡开始的。

9月6日，叶群和林彪儿子林立果分别得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情报”，开始策划。……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专列到达北京丰台站。

毛泽东完全是战争状态，他与提前约好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后，要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全副武装师。

15时36分，毛泽东专列从丰台站开出，16时5分到达北京站。

林立果几乎在同一时间，得到了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据汪东兴说，林立果立即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

奇怪！汪东兴怎么能知道林立果打电话的内容？

更奇怪的事情是谁这么嘴快？这个通风报信非同小可，直接导致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如果林立果不知道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消息，就不会慌慌张张坐256三叉戟去北戴河。如果北戴河没有256三叉戟，林彪怎么可能半夜“机”叫！可是，把毛泽东如此绝密的行踪通风报信给林立果，为什么在“九一三事件”后没有得到任何处理！甚至好像世界上没有这位通风报信者一样。如果通风报信者是林彪一伙，“九一三事件”后怎么可能逃得掉？绝对是第一号死党。可是，被“九一三事件”层层“圈”起来的人成千成万，却没有这位通风报信者。换句话说，通风报信者并不是林彪一伙，而是有意为之！

林立果本来是不知道毛泽东何时到北京的。毛泽东离开上海后，王维国打电话告诉了他。林立果并没有特别惊慌，只是生气在南方的暗杀计划失败。至于毛泽东何时回北京，还不确定。毛泽东一路上可能在南京、济南、天津等地逗留，林立果认为他还有时间，却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汪东兴说：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北京的消息后，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

汪东兴的书中没有说这位通风报信者是谁，但十之八九是汪东兴。因为能够知道毛泽东行踪的人极少，尤其是1971年毛泽东这次南巡，更是诡秘。现在看，能够将毛泽东行踪报告林彪的人只有汪东兴。也只有汪东兴的通风报信，能免除“九一三事件”的灾祸，别的任何人都不可可能。

这是毛泽东打“草”惊“蛇”的步骤之一。

毛泽东的专列从来没有在白天驶进北京站。这次毛泽东白天到北京站，他也没有下车，一直耗到天黑才回中南海。毛泽东害怕有飞机轰炸中南海！

17时左右，周恩来起床，进了卫生间，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报告毛主席回来了。周恩来有些吃惊，说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主席怎么不声不响回来了？路上没停？杨德中说路上除了加水以外，直奔北京。周恩来问什么时候到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周恩来很快带卫士张树迎到人民大会堂，20时要召开政治局部分委员和有关部长讨论四届人大政府报告，黄吴李邱中只有黄永胜参加。

紧张气氛并不是林豆豆报告后才有的，周恩来一到人民大会堂，就得知情况紧张了。平时周恩来的两名卫士轮流值班，9月12日这一天的值班卫士是张树迎。但是因为情况紧张，张树迎忙不过来，又叫来周恩来的另一名卫士高振普到人民大会堂来。这时高振普刚吃过晚饭，就匆匆来到人民大会堂。至此，他们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周恩来只合衣睡了两个半小时。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说：我们跟主席出去，率100多人的干部队，这个中队是专门为毛泽东外出服务的。除少数人看家，多数都跟着。事后看，林立果那一套能实现吗？张耀祠说，不可能实现，林立果虚构，不可能的，他那些意图搞不成。还是个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是他们的意见，不是林彪的意见。我们给部队都要讲，8341部队一个一个都是精选的。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都是当地的。在哪个省行走，由哪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要放警卫。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70、9月12日夜，叶群从什么时候开始紧张？

9月12日晚上，林立果坐256三叉戟都快到山海关了，北戴河这边还没有派车去机场接。不知道是林立果打过电话了，还是叶群忘了，直到山海关机场询问，叶群才匆忙吩咐派车。刘吉纯正向司机交代任务时，大飞机的声音就出现了。肯定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去接。半路上碰到林立果开着机场的吉普车，二话不说，林立果换上接他的车开走了。这件事不大，但似乎说明叶群当时的心态已经杂乱无章。

叶群是最沉不住气的女人，但9月12日夜里她一直在煲“电话粥”。因为原计划9月13日6时去广州。时间还早，她与留守毛家湾的秘书于运深讲了半个小时，然后和邱会作夫人胡敏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叶群刚放下电话不到15分钟，23时30分，周恩来打来电话查问三叉戟，叶群又与周恩来讲了几十分钟。周恩来问叶群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没有，马上又改口说有，是我儿子飞来的。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吧？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放下电话，叶群有些慌了，平时林彪用飞机，周恩来从不

过问。在这种非常的时候，为什么突然关心起三叉戟呢？还说要北戴河来？

周恩来还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要专机师准备飞机，他要亲自去北戴河。不久，叶群打来电话，告诉吴法宪，等一会儿，周总理很快会给你打电话。你能来也好。吴法宪说让34师师长时念堂去，叶群对时念堂不熟，提出还是胡萍来。胡萍在住院，在这种时候调动飞机，吴法宪不能决定，他还要请示周恩来。吴法宪向周恩来提出，立即去机场追查。周恩来表示同意。吴法宪带张秘书和警卫员直接从办公室到了西郊机场。这时胡萍还没回医院，正与专机师的龙参谋长谈话。北戴河这边，叶群也还没有“跳”起来，安静了半个小时。

这时，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的电话，说西郊机场的飞机被“封”了，要“四人”共同下令才能起飞。叶群这才紧张了，她要问一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能问谁？她会问黄永胜。而黄永胜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而周恩来接到张耀祠转来的林豆豆报告后，专门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员不许出来，也不许接电话。叶群找不到黄永胜了。家里没有，办公室也没有，黄永胜能到哪里去？只能是被抓了。叶群彻底慌了，在走廊里跑来跑去，这屋跑到那屋，不住地喊，有人要来抓首长了，再不走就走不了了，96楼乱成一团。在此之前，叶群到林彪屋里好几次，刘沛丰守着门，谁也不让进，林彪内勤小陈、小张也不让进。叶群连外衣也没穿，和林立果一起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前后没几分钟就坐“大红旗”走了。

周恩来已经接到8341部队的报告，为证实林彪是不是跑了，零点刚过，他要林彪的电话。军委总机马健英接通了100号林彪的专线，没人接，200号叶群的专线，也没人接。这是不可能的呀？怎么可能没人呢？她以为线坏了，要通中南海总机维护线路的值班员，检测说电话是好的，有正常的铃声。马健英纳闷：怎么工作人员也不见了？

7 1、是谁让林彪女儿林豆豆也上三叉戟？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前前后后，林豆豆报了四五次。为了不让“大红旗”去山海关机场，林豆豆和张清霖提出四条措施，一、调一辆大卡车来，把公路堵死；二、莲峰山路不宽，两边都是松树，砍掉一棵大树，把路挡住；三、调20名警卫战士拦截车辆；四、封锁去机场的道路。当时8341部队的领导同意，但当林彪等人即将上车时，却一条也没有实施。

姜作寿回忆：林彪住在山上，就一个路口，卡车开上去，堵一堵，就把路堵死了，除非“大红旗”插翅，否则别想走。可拦截林彪的“大红旗”，北京不发话，根本不可能，谁敢？上边没指示，我叫副大队长于仁堂先把“大红旗”看起来。现在想，林彪不跑还真没办法，谁敢上去拦？

23时40分，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再次向北京报告，他们已经调汽车了，我们怎么办？张耀祠说：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去的方向。张耀祠回忆：因为这时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交代张宏注意去的方向。

北戴河这边的情况是什么时候报告毛泽东的？还是毛泽东没有态度呢？毛泽东不是在三叉戟还没起飞前就到人民大会堂了吗？周恩来得到北戴河的报告，第一件事就会报告毛泽东。

张耀祠刚放下电话，张宏的电话又来了，说林彪他们出来了，刘沛丰手里提着四个皮包，先上车，林立果、叶群、林彪都上了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开走了。

张清霖回忆：我又从屋外进来，林豆豆建议从反方向派部队拦截。向北京请示，还是迟迟得不到答复。张耀祠说，你跟张宏说。张宏接电话后，突然变了态度，叫我别在这里指手划脚。我气坏了，都快发生火并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张宏声音很大，当着很多人的面，让林豆豆快上飞机，我在旁边，就这句我记得清楚，“中央命令你们也跟着上飞机”，林豆豆冷静地问谁下的命令？没有回答。林豆豆趴在桌上哭开了，站起来，坚定地说：我死也不走，要走你们走。我把从战士手里“抢”来的枪推上子弹，叫张参谋马上跟北京联系，一直没声音，林豆豆夺过电话，中间冒出汪东兴的声音：“早找我不就好了？”再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她把话筒摔了，这时外面的枪声响了。

以后姜作寿说让他们也上飞机。

在北戴河的8341部队的上级是张耀祠，张耀祠的上级是汪东兴，汪东兴在毛泽东身边。

可张耀祠是另一种说法，警卫另有飞机，我没叫姜作寿他们上飞机，那一架专机就是林彪一家子。让林豆豆上飞机更不可能，我怎么叫她跟着走？据张耀祠说，三叉戟起飞后，林豆豆还两次打电话给他，准确时间没记清，当时很紧急。头一次说飞机起飞了，听到了飞机的声音。第二次她问飞机截住了没有。

林豆豆、张清霖和8341部队在场的姜作寿都听到了“让林豆豆上飞机”的指示，是谁下达的指示？因为“指示”是下达给张宏的，张宏已经去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以从审查时看出来。张清霖说，负责审查我和林豆豆的谢静宜叫我们以“党性”保证不准再提这件事，这又是为什么？

72、张耀祠让副团长张宏去报告林彪了吗？

林立果9月8日走后，林豆豆让张清霖在楼下站岗，她一个一个找工作人员谈话。然后和张清霖转山看地形，忙了几天，到9月11日看没有动静，以为林立果搞不下去，就睡了一天。9月12日也没觉得什么，林立果突然从北京回来，一下子到了紧张的最高点。得知林立果和叶群要把林彪弄到广州去，林豆豆很着急，怎么办？她认为林立果的办法显然是死路一条。林豆豆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保住林彪。要保住林彪，就哪里也不能动，呆在北戴河最安全。

当然，直接告诉林彪，如果林彪想走，那谁也没有办法。如果林彪同意不走呢？

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都以为还有机会。

这样，凭林豆豆和在场秘书的力量不可能，不得不求助8341部队。

9月12日夜间，林豆豆对李文普说，我们要赶快报告。李文普怕承担责任，说我不去，怕他们有事找。22时30分，刘吉纯领着林豆豆从小路去大队部。部队全睡了，大队长姜作寿和卫生员小陆在下象棋，刘吉纯把姜作寿叫出来，林豆豆有事跟你说，就把他领到树林里，刘吉纯说上边可能有事，我得上去看看，临走嘱咐林豆豆别回去了。

姜作寿听林豆豆说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林彪走，大吃一惊，要向北京报告。林豆豆不想向北京报告，但警卫部队行动必须得到北京的同意。姜作寿向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张耀祠报告后，说北戴河还有个副团长张宏，应该向他报告一下。张宏很快被车接来了。

23时多，副团长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说林豆豆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挟持林彪今

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豆豆让我直接给你报告。张耀祠在汪东兴的秘书值班室接的电话，汪东兴和他的秘书都在场，张宏说一句，张耀祠重复一句。随后汪东兴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张耀祠听完张宏的报告后，交代了四条，一、派人严密监视林彪住所的动静；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8 3 4 1 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回忆：副团长张宏向团长张耀祠报告后，按照张耀祠的指示，准备报告林彪，被姜作寿拦住了。说情况复杂，平日林彪的家我们是不去的，你要去，我就要跟你去。万一发生不必要的牺牲，部队谁管？张宏说，那怎么办？把林彪老婆和儿子抓起来，张宏表示胡闹。

这时林立果几次打电话找林豆豆，都被姜作寿挡住了。

可是据张耀祠说，他没有让张宏到林彪家去。

现在我们看张耀祠的四点指示，首先是严密监视。这是几十年后张耀祠的回忆，当时敢说“监视”吗？那时还是林副主席，顶多说去看看。这句话就比较含糊，张耀祠的意思可能是“监视”，而张宏理解的意思是看看林彪知道不知道。于是，就有了张宏想去报告林彪的举动，如果张宏报告林彪了，林彪还能走吗？可惜没有实现。

为了落实张耀祠“监视”的指示，姜作寿在山上转，注意林家的动静，这时林家已经格外“热闹”起来。很快“大红旗”冲下了山，姜作寿拦了，虽然没有拦住，但如果他不拦，李文普不会下车。

7 3、2 5 6 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时有故障吗？

1 9 7 1 年 9 月 1 2 日 1 9 时 4 0 分，2 5 6 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

这绝对是临时行动。因为 1 6 时左右，在没有接到起飞通知前，潘景寅吃了三片安眠药。他怕夜里有任务，所以准备在理发室理发后，抓紧时间睡一觉。没想到刚吃了安眠药，在理发室理了一半发，起飞命令就来了。潘景寅在候机室对 1 0 0 团政委安治梁说，我吃了安眠药。这非同小可，到这个时候又不可能再换人，安治梁交代第一副驾驶陈联柄在飞行中多注意些。但是据康廷梓回忆：潘景寅并没有让出驾驶员的位置，他还是坐左座（主座），操纵飞机，第一副驾驶陈联柄坐右座（副座），这一趟飞行 4 0 余分钟，2 0 时 2 0 分左右安全落地。

2 5 6 三叉戟上机组九人，送林立果去北戴河。林立果带的人中，除刘沛丰、程洪珍外，还有林立果带的两个女兵小张和小袁。

据女兵小袁回忆：2 5 6 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时发生了故障。飞机升空后突然倾斜，机身摇摆，声音非常大，服务台上的茶杯暖瓶都滑到地上……

第二副驾驶康廷梓在 2 5 6 三叉戟上，他没有飞行任务，随便坐在给林彪准备的座椅上。康廷梓说飞机从西郊机场起飞时根本就没有发生故障，不管是起落架还是发动机，都没有发生故障。至于小袁说飞机上升时，倾斜、摇摆、摔茶杯这件事是有的，康廷梓说：杯子从桌上滑落，大概是摔碎了一个。但那是飞机上升时的正常现象，问题是空中服务员小魏没有把茶杯和暖壶固定好。2 5 6 三叉戟突然起飞，东西来不及收拾好，也是情有可原的。后来在山海关机场的飞行后讲评会上，小魏还专门为摔杯子做了检讨。

但是潘景寅有没有责任呢？我专门问时任空军34师师长的时念堂。他说：摔杯子说明潘景寅起飞时紧张，一般情况下是不应该摔杯子的。我想：这是不是和潘景寅服了安眠药有关？不过，飞机上升，飞机斜了，飞机里的桌子肯定是斜的，杯子不固定当然要坐“滑梯”了。既然飞行员康廷梓认为飞机上升时倾斜是正常现象，那就应该是正常现象。

小袁回忆林立果不让她们两位女兵下飞机，可能也虚。普通飞机都不可能机组走了，让客人留在飞机上，更何况专机！专机在外，怕有人搞破坏，有严格的警卫手续，怎么可能让客人留在飞机上？退一步讲，无论如何也要下来吃饭吧？或许林立果是让两位女兵留在机场，她们理解错了，要不就是林立果说错了，但意思是让两位女兵在机场等候。而且这时，林立果还是打算第二天早上7时飞广州，半夜“鸡”叫那是林立果到北戴河后的临时变故。所以，林立果无论如何不可能让两位女兵在专机上等候。

可能这两位女兵很少坐飞机，所以有些大惊小怪。如果小魏真的说起落架有故障，那也是小魏的猜测，她不是飞行员，她不懂。至于下飞机机组说检修飞机，可能是不懂飞机的两位女兵听错了，或者是机组的口头语，飞行后检修飞机就是检查飞机。既然康廷梓说在山海关下飞机时没有人说飞机有故障，机组说的意思应该是检查飞机。因为很快，机组全体一起把飞机的“眼”堵上了，都下了飞机。

康廷梓说：山海关的飞行后讲评会上没有人说256三叉戟有故障。

256三叉戟绝对不可能发生故障。如果有故障，潘景寅绝对不敢从山海关起飞。叶群、林立果再催得急，也不会飞。起飞不就是为保命吗？飞机有故障，上天不等于自杀吗？

而且，256三叉戟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号专机。1970年四架三叉戟从巴基斯坦进口，256三叉戟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座机，但飞的时间长一点，所以就定了254三叉戟为一号专机。但是检查发现，254三叉戟的外壳被小鸟撞了一个小坑。这样就不能当专机了，256三叉戟承担了一号专机任务，全面改装，把另外三架三叉戟上好的零件调换给256三叉戟，甚至调换的四台发动机中最好的一台发动机。256三叉戟主管机械师沈宝发天天“泡”在256三叉戟上，他说，维修的时间太长了，老是不执行任务，就老得检修。所有的零件都摸熟了，一遍又一遍，保证没有任何故障。

74、“九一三事件”后紧急战备，为什么绕开黄吴李邱？

“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周恩来忽然成了“军委主席”。军委总机一号台回忆：1971年9月中旬，周恩来要电话比以往更多，亲自要电话的时候特别多，也特别急。9月12日晚，短短几小时，他要了20多个电话，声音都沙哑了。凌晨1时，军委总机刘淑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总机以最快速度把各大军区司令员叫到保密机前，告诉他们在岗位上不要离开。几分钟内，总机把休息和没有休息的司令员们都叫到保密机前，等候总理指示，叫他们不要离开，总理随时要和你们讲话。事后，一位军委首长对总机说，你们搞了一次大军区司令员的“紧急集合”啊。

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刚入睡不久，电话急促响起来。是周总理的声音，你是曾思玉同志吗？我是周恩来。报告总理，我是曾思玉。庐山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你听清楚了吗？报告总理，我听清楚了。你们立即进入指挥所，紧急备战，你们少数同志知道就行了，封闭所有的机场，你听懂了吗？我听懂了，坚决照办。曾思玉马上通知政委刘丰，副司令李化民和管作战的副参谋长唐皎。十多分钟后，曾思玉到达指挥所，通知武汉军区空军政委萧前，关闭所有机场，实行空禁，把拖拉机、汽车停在所有机场的跑道上。

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打电话给曾思玉，他也接到周恩来同样的电话，弄不清是谁，又不敢核实，猜是吴法宪。曾思玉说：不是那个“胖子”，是那个“瘦子”，在大会讲话的那个人。张国华大吃一惊，是他？

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布置完了以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研究部署应付各种情况的措施。会前周恩来和叶剑英共同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紧急战备指示，周恩来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并让他转移到玉泉山9号楼待命应变。叶剑英连夜交代秘书准备军用地图和卡车，马上搬家。

3时多，周恩来叫吴德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吴德下午从丰台回来后，到吴忠家谈了很长时间，讨论对毛主席提出的第十次路线斗争应该怎样认识，是不是需要将毛主席的谈话给市委常委或者市委书记先吹吹风，以免将来问题出来了，大家没有思想准备。直到后半夜1时多，也没考虑好怎么传达。吴德说，今天恐怕议不出来妥善办法了，明天再说吧。回家后，吴德就吃了安眠药睡了，直到被电话惊醒。

吴德走进人民大会堂时，看到周恩来神色十分紧张，正在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恩来对吴德说，北京军区要紧急备战，要让卫戍区派部队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防止再有飞机外逃。吴德提出，战备问题，只跟我一个人谈不行，是否让北京军区和卫戍区的负责人一起谈。周恩来同意。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来了以后。周总理传达毛主席决定，首都立即处于紧急备战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吴德和吴忠商量后，向周恩来提出，卫戍区政委杨俊生应该和我们一起参加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杨俊生的情况，表示同意。接着周恩来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北京郊区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吴德和吴忠回到卫戍区，首先布置民兵监视天空，卫戍区准备好了一部分摩托部队，随时可以出发到直升机降落的地点。同时派出卫戍区部队封锁机场，西郊、南苑、沙河、良乡、东郊机场，真枪实弹，没有周恩来的命令，对强行起飞的飞机可以立即开枪，高射炮可以立即开炮。第二，要在机场设置障碍物，阻止飞机起飞。第三，要将所有飞机上装载的油料全部抽空。

9月13日，根据中央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38军的三个机械化师、坦克1师和炮兵6师共六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卫戍区原来四个师，就变成十个师了。那时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不知道还会有不会有飞机起飞，非常紧张，经过研究，确定了重点防御区域，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一带，南达保定以北，9月13日或14日，部队进入预定位置。9月15日，卫戍区召开作战会议，各个师负责人参加。当时强调保密，下边不知道情况，执行任务时，遇到一些问题，也老有人问，很不好办。最后报经周恩来同意，14日或15日，召开卫戍区师以上干部会议，讲了林彪叛逃的情况，传达了中央指示，与会者都大吃一惊，林彪是副统帅啊，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这一系列的应急措施，实际上内防政变，外防侵略，怕苏联乘虚而入。像这样重大的战略部署，按常规应该向中央军委、各总部请示报告，但为什么不按常规来办呢？吴德和吴忠分析，黄吴李邱都是军委、总部的负责人，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们跟林彪可以说一伙的，虽然对他们没有采取措施，但不等于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当时的情况很特殊，他们商量后决定，根据

中央指示精神，必须确保卫戍区的部队置于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指挥下，要求卫戍区的机关、部队，来自军委、总部的电报只收听，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布置的应变措施的情况。

黄吴李邱就这样被故意绕开了。

（未完待续）

□ 选自 舒云新浪博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